论 文 目 录

序言 …… 吴海鹰

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郑和航海？ …… 华 涛 （1）
郑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先行者 …… 肖 宪 （5）
郑和七下西洋的功绩及其历史地位 …… 马 通（13）
郑和下西洋与人类航海事业的新纪元 …… 李华英（19）
番客东来与郑和出使西洋 …… 杨怀中（27）
回族古籍整理兼及郑和二三事 …… 吴建伟（37）
郑和的家世与功绩 …… 姚继德（42）
郑和的身世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 …… 段西宁（48）
略论郑和下西洋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 …… 梁向明（54）
郑和、古里与古里马氏浅探 …… 翁乾麟（60）
从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看明代之中华文明中心论 …… 沙宗平（66）
试论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质 …… 魏淑霞（76）

郑和精神与伊斯兰文明 …… 龙 群（80）
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 宋 岘（83）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回族穆斯林 …… 魏德新（90）
穆斯林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作用 …… 马广德（98）
从穆斯林的角度看郑和及其航海事业 …… 赵国军 马桂芬（105）

郑和下西洋给世界文明的启示 …… 马 经 谢 明（115）
现代视野看郑和下西洋 …… 丁万录（120）
郑和的开放意识与航海事业 …… 马兴东（124）
郑和的世界 世界的郑和 …… 王 锋（1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兼容并重:郑和宗教文化思想论 …… 薛正昌(136)
从辉煌到衰落的历史思考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 马志荣(143)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郑和研究 …… 马亚萍(149)

蒙·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 …… 马明达 马建春(153)
波斯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社会 …… 王建平 王义芳(162)
波斯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穆斯林 …… 〔日本〕松本耿郎著 孙俊萍译(168)
汉语语境中的文化表述与中伊哲学的交流
——论《勒瓦一赫》和《真境昭微》的中伊哲学思想的融通 …… 丁克家(175)
从中国波斯语教学活动的历程看中伊(朗)文化交流的发展 …… 丁 俊(185)
起源于波斯的中国和泰国相类似的伊斯兰教传统节日 …… 〔日本〕松本光太郎(191)
融会贯通东方神秘主义
——塞佩赫里思想研究 …… 穆宏燕(195)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伊朗电影在中国
——以影片《女人花》为例 …… 马 婷(206)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伊朗电影在中国 …… 吴 真(211)
近十年来中国的伊朗研究论文综述 …… 孔炜莉(218)

中阿伊斯兰文明的交流 …… 〔巴基斯坦〕哈里伦·拉合曼·汗著 王根明译(229)
伊斯兰哲学与中国文化 …… 〔伊朗〕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著 孙俊萍译(236)
伊斯兰多元主义与宗教对话 …… 杨桂萍(242)
现代中国伊斯兰与基督教的和睦共处
——宗教对话中的胡籍明·胡理门 …… 〔日本〕松本真澄 丁克家译(249)
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 …… 伍贻业(255)
浅谈明清时期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对话 …… 王丽宏(263)
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与儒家文明 …… 米寿江 马多勇(268)
从“经堂教育”管窥文明交往的规律 …… 马福德(276)
“述而不作”“守故得新”
——文明对话之一种方法例说 …… 马进虎(279)

波斯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伊斯兰思想的关系 …… 〔伊朗〕里泽·艾克巴利安著 丁俊译(287)
穆拉·萨德拉及其高级哲学 … 〔伊朗〕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著 马生贵著 王锋译(300)
试论苏赫拉瓦迪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 孙俊萍(308)

《拉失德史》(Tarikh-i-Rashidi) 与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以苏非派和卓家族史兴起背景为中心的探讨 …… 张中复 (319)
觉醒—— 一个中亚苏非隐修者 …… 帕林达 (334)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伊斯兰法 …… 马明贤 (340)
论世界三大一神宗教产生的条件及其思想传承 …… 敏文杰 (347)
多元、依存与相关
——当代宗教间对话的背景研究 …… 李　林 (353)
科学与宗教间对话机制的探构 …… 吴建华 (364)
哈塔米的文明对话思想 …… 白志所 (368)

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 …… 马明良 (374)
“文明冲突”背景下中国穆斯林民族发展走向的若干思考 …… 马　平 (382)
从回族的文化认同看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问题 …… 丁　宏 (386)
伊斯兰教在回族乡村建设中的系统分析 …… 丁自贵 (394)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门宦 …… 马宗保 (399)
哲麻提 (Jamaat)、稳麦 (ummah) 与汉文化语境下的族群认同的建构
——回族形成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 杨文炯 (407)
赞圣诗与时间意识的关系 …… 〔澳大利亚〕高安东著　孙俊萍译 (418)
阿拉善草原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 …… 丁明俊 (434)
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综述 …… 王伏平 (453)

英文提要 …… (461)

序　　言

吴　海　鹰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中国各地纷纷开展隆重而丰富多彩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7月1日-3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来自伊朗、巴基斯坦、日本、保加利亚等国及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河北、广东、新疆、甘肃、陕西、青海、云南、台湾、宁夏等地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12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进行为期3天的学术交流。

600年前，中国航海家、外交家郑和率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船队远行，足迹遍及亚非40多个国家，600年后的今天，我们召开“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壮举。此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呼吁人类文明对话、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历史上，郑和七次外出访问，每一次都是文化经贸之旅、和平之旅。郑和远洋船队所属官兵，同所到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平等贸易，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往来，深受各国人民的尊重与敬仰。尤其是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先贤们，为当时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接触与了解，做出了杰出贡献，实现了中外文明之间重要的历史性对话，为中外文化的友好交流立下了奠基之功。

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就是要弘扬郑和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精神。中国和伊朗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中伊两个国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两国往来不断，特别在近些年来，两国高层互往增多，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伊关系进入新的阶段。中伊双方共同主办的这次研讨会就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的精神。

郑和下西洋在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文明之间的交往树立了个光辉的典范。今天我们重温郑和下西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单纯是为了纪念它，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和探讨郑和下西洋在传播文明、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探索今天文明对话、交流、合作的途径，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文明对话，其目的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和睦共存的美好前景。

此次“郑和下西洋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郑和下西洋与文明传播”、“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国伊斯兰文明的关系”、“重振丝绸之路，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经贸关系发展”、“文明对话”，研讨会秘书处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提交的中英文论文80余篇，学术著述多种。

中外代表的论文和专题讨论的议题涉及了十分广泛的议题。与会的中外代表们对“郑和航海的意义”、“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中国文化与波斯—阿拉伯文化间的交流”、“伊斯兰教研究”、“文明对话”、“回族穆斯林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研讨。

伊朗穆拉·萨德拉哲学基金会主席、伊朗穆拉·萨德拉哲学研究所所长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教授认为,“丝绸之路”堪称是西方文化命脉,人类的文明从中国到伊朗穿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中国和伊朗两个文明古国为人类奠定了文化基础。当伊斯兰教出现以后,它把所有的文明集中到了一起。伟大的先知首先想到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追求智慧、知识科学,即便是远到中国。中国和其他的文明古国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伊斯兰教是各宗教之间对话的基础,当伊斯兰哲学和伊斯兰文明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伊斯兰学者立刻和中国的佛教、道教以及儒家的学者们展开了对话。在这之中有两大目标:一个目标是使人类的思想得到发展;第二个目标是使人类和睦共处,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和平的生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利博士认为郑和是一个穆斯林,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航海家,郑和所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推动了东西文明的交流和合作。现在的世界就需要这种精神,全世界的穆斯林更需要和平与文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联络组织主席易拉吉先生专门从德黑兰发来贺信,他认为中伊文化、经济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丝绸之路就是见证,这条历史之路不仅代表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为文化思想和伊斯兰教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郑和以其高超的才能,过人的智慧,获得人们的尊重,并得到了当时明朝皇帝的恩宠,因此任命他为海军统帅之职,明朝皇帝为展示其国家的繁华与文明,激励明朝与多国建立关系。因此,皇帝派郑和作为使者,代表明朝皇帝与35个国家和地方进行交往,把友好、和平、文化交流的信件带到亚洲各地、印度洋、非洲各地。郑和是个政治文化人物,他本身是下西洋者的后代。中国政府在全国,特别在北京、南京、昆明举行会议,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文化艺术展览并在电视频道播放郑和崇高的精神和在历史上的地位,表现中国人对这位历史人物的尊敬。

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校监哈里伦·拉合曼·汗认为当今人类面临机遇与挑战、和平共处与文化冲突、经贸往来与优势互补的抉择。在这世事纷繁无所适从的抉择路口,人们发现在通向抉择关口不同的途径中,中国就如难以风平浪静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拥有不同文化的稳固的岛屿。(历史上)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有意识地为现代社会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明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是文明社会发展的最有力的引擎,是新主张最有力的来源。

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杨怀中研究员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访问亚非30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为中国在明朝实现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接触与了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外文明之间，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对话，为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立下了奠基之功。作为中国的回族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郑和七下西洋，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是坚决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的民族，穆斯林民族是世界上酷爱和平的民族，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热爱和平的宗教。郑和七下西洋蕴藏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宣扬郑和所奉行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思想，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郑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穆斯林民族的骄傲。

中国南京大学教授华涛博士认为郑和航海确实是一场文明的对话，当我们承认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那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人在15世纪初已经为“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宣传和纪念郑和的辉煌业绩，不仅对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进一步推动郑和研究的国际化。

与会中外学者以文明对话为大的学术文化背景，突出研究的主题，采用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研究问题；有史实的研究，也有理论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反映了这次会议的学术深度和水平。此次研讨会达到了交流思想，增进理解，促进合作的目的。由于本次会议自始至终使用双语：汉语和英语，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是促进不同文明对话、推进中国对外开放、发展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关系、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学术交往的一次成功会议。会议由宁夏社会科学院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共同主办，宁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宁夏回族民族事务委员会、西安三宝双喜集团公司协办，中、伊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对会议给予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利博士上任伊始，即专程到宁夏积极探讨和宁夏学术界的合作途径。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是双方合作的良好开端。谨在此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及阿高杰利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参与协办会议的各兄弟单位领导及所有与会中外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6年5月28日

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郑和航海？

南京大学　华　涛

郑和是中国明朝伟大的航海家，从15世纪初开始，他率领中国船队开展了中国航海史上最伟大的航行。郑和船队在7次航海中，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如船队规模之大，组织之完善，大规模船队供应的完备，船队跨越几个大洋的高超航海技术，甚至外交方面的相对平和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伟大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时，每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同时这些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当然也是人类历史上航海进步的伟大成就。但是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纪念郑和，是否还有更加重大的世界意义？或者说，郑和航海到底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什么重大意义？换句话说，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也让世界上其他人认为郑和航海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

一

在讨论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时，近年来郑和航海研究和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的准备活动中的两种倾向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强调郑和船队的航海是和平之旅，二是强调这次中国人海外活动是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

如何认识“和平之旅”？

明朝政府在明朝初年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的原因，是郑和研究中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不仅学术界对此有各种讨论，甚至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概括起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寻找建文说”和“耀兵异域说”两大方面。

1368年推翻元朝之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了明朝。但是朱元璋去世后他的孙子建文帝在南京继承皇位后，雄踞北方的燕王朱棣不服，起兵发难，攻克南京，夺得皇位，改元永乐。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的就是这位被后世称为永乐皇帝的朱棣。当时建文帝在乱兵中不知下落。按史书记载，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是永乐皇帝朱棣继位后的一大心病。郑和12岁“初事燕王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朱棣称帝后，郑和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后来朱棣派他率领船队下西洋，《明史·郑和传》就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这种说法后来有不少人附和。带着皇上寻找建文帝下落的秘密使命的航海，如果得到建文帝的信息，如果得知任何海外政权接纳了建文帝，郑和船队就很难和平外交了，中国船队至少会以强大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迫对方交出建文帝。这当然就谈不上是和平之旅了。

不过“寻找建文说”被许多学者怀疑。建文帝虽然是朱棣的心头大患，但认为朱棣需要不断派

遣庞大船队前往西洋去寻找,却说不通。特别是下西洋的航行前后 7 次,到后几次航海时,朱棣已经去世,建文帝的威胁早已经不存在,所以“寻找建文说”不能自圆其说,至少不可能是整个航海活动的原因。因此有人按照《明史·郑和传》“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说法,强调明朝多次派遣庞大船队下西洋的“耀兵异域说”。关于郑和率领的船队在海外发生武装冲突的记载并不多,但如此庞大的船队在海外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希望各国都能够遣使朝贡,而且当时也确实有许多东南亚、南亚国家迫于明朝的威力来到“天朝上国”,当然不是一件值得纪念特别是全世界纪念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还有所谓的“友好关系说”,与“耀兵异域说”类似,强调明朝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是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武力威胁之上,那么今天郑和曾经造访过的各国如果纪念郑和船队的航海,他们的赞颂一定会大打折扣。所以当我们说郑和船队在 15 世纪初进行了“和平之旅”时,我们实际上很难将它提升到世界意义的层面。

如何认识“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

纪念郑和航海的人往往强调这次海外活动对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意义。南京近年来复建的阅江楼有一幅大型壁画,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传播中华文明”。

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我们也不否认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传播。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有些国家、地区、民族走在前面,有些落在后面,落在后面的应该在交往中向走在前面的学习,走在前面的也有可能“传播”自己的长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郑和航海“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的说法,它实际上与所谓的“教化异族说”如出一辙,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而被郑和船队造访的各国各地区的落后;强调的是单向的传播和输出,而对方则是对“教化”的被动接受和承认。这既不符合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人类文明多样发展的规律和今天公认的文明交往中相互学习、借鉴的基本模式,也不符合当时的史料记载。比如当时西亚阿拉伯史料中就将郑和船队的造访称为“朝贡”,他们认为东亚明朝的中国人来到阿拉伯——波斯之地,是仰慕西亚的文化和强大。

总之,当我们仔细检阅目前关于郑和船队航海伟大意义的各种观点时,我们发现现有的各种观点都很难被提升到世界意义的层面上。

二

关于 15 世纪末欧洲开始的大航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郑和航海的伟大意义。

在郑和率领中国船队从事空前航海活动的 15 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航海活动扩大,地图科学发展,古典时代的知识重新被认识(如托勒密的著述)。而 15 世纪后期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统治者对航海活动的支持,更促进了航海活动的开展。到 15 世纪末,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1488 年初绕过好望角的迪亚斯,1492 年向西航行到达美洲的哥伦布,1497~1498 年环球航行的·伽玛,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为了纪念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航行,100 多年来西方国家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最近 10 多年的重要活动是 1992 年前后纪念大航海时代 500 周年时的一系列世界性的活动。而在美国,现在每年的 10 月 12 日或者 10 月的第

二个星期一已经是正式的国家节日——哥伦布日，不仅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而且公职部门放假休息。不少美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纪念日。

但是1992年10月12日星期一的哥伦布日，笔者却在哈佛大学校园遇到我此前不曾想到的事。哈佛大学的美国印第安学生不是在庆祝哥伦布日，而是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纪念哥伦布，反对将10月12日作为国家的节日。后来我注意到，实际上反对庆祝哥伦布日的不仅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印第安学生。例如2002年10月委内瑞拉总统签署法令，将委内瑞拉的哥伦布日改名为“土著民众抵抗日”（The Day of Indigenous Resistance），并公开呼吁美洲人不要庆祝这个节日。

在反对和赞成庆祝哥伦布日的问题上，反对者强调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带给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是长达150多年的“种族屠杀”，这场屠杀的结果是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赶尽杀绝，最后被“保护”在了一些保护地中，而在南美洲，欧洲移民的后代主导着当地社会。反对纪念哥伦布日的人还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根本就是莫须有，美洲从来不是空无人烟的地方，印第安人早就生活在美洲广袤的土地上，并且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加、玛雅等），而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到来的欧洲殖民者带给美洲的，是对美洲古代文明的毁灭。除此以外，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的奴隶贸易也大规模展开，摧残了非洲的社会和文化。这样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如果需要纪念的话，那应该纪念欧洲殖民者对人类的破坏。

而赞成庆祝哥伦布日的人认为，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标志着人类历史走出中世纪，标志着美洲走出隔绝的状态，标志着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明和伽利略、牛顿以来的现代科学文明来到了美洲，也标志着现代美国诞生的可能。他们认为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紧接着西方开始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推动力，而工业革命集聚的能力，也为西方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从此世界开始迈向现代化的新世纪。这些人认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各种不人道的行为和事件，但那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恶”，人类是在“恶”的过程中发展的。如果否认哥伦布等人的成就，那就是否认西方文明和人类进步。面对激烈的争论，美国政府在纪念哥伦布抵达美洲500周年的1992年不得不退缩，虽然各种民间的纪念活动仍然进行，官方的纪念活动基本没有举行。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前后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纪念15世纪欧洲大航海5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宗旨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发展”，当然不能够仅仅为西方文明喝彩。那么它纪念地理大发现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它如何才能让世界各国都同意纪念欧洲人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将15世纪末的事件看成是人类文明的碰撞，而纪念的目的反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史》杂志一篇社论的结语：“我们并不掩盖这个人类伟大探险行动的困难、误解和冲突，我们致力于的首先是确定它对历史的基本贡献，这就是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

正是在“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这个基调上，地理大发现才成为了世界各国都参与的纪念活动。也只有依据这个基调和基本原则，我们才能够以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公认的道理解释历史上的事件，不论其中有多少“恶”的存在。

郑和航海的时代当然不同于欧洲大航海的时代，郑和船队的不少外交政策和行动也不同于欧

洲航海家，特别是明代的中国不同于即将开始殖民活动的西方国家，在郑和造访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之后，中国人自己放弃了海外活动，而且不久以后，中国也成了西方殖民活动的目标。但是当我们纪念郑和率领的明朝船队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时，我们仍然很难将它的历史意义归结为“和平之旅”或者“中华文明的传播”，或者说，我们很难让中国以外的其他人在这样的意义下纪念郑和的航海。大概只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欧洲大航海的基调和原则——“发现文明的多样性”，并强调“文明对话”的理念，才能真正将纪念郑和的活动推上世界舞台，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什么要纪念”的问题。而郑和航海确实让东西亚洲的人民在蒙元以后再一次有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接触，让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反之亦然，“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当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和航海也确实是一场文明的对话。这场对话可能是借鉴，比如中国人借鉴阿拉伯——波斯的航海技术，也可能是碰撞，尽管碰撞可能是残酷的。但无论如何，当我们承认 15 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那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人在 15 世纪初已经为“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实际上仅仅从航海技术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对话：15 世纪初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阿拉伯——波斯的航海技术（元朝在福建沿海搜集“回回航海书”），而到 15 世纪末，达·伽马横跨印度洋时依靠的是一位阿拉伯水手（所谓的 IbnMajid）。

郑和——中国和平外交的先行者

云南大学　肖　宪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就包含着“以和为贵”的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基础。历史上，中国从未因自己强大而去侵略或欺负他国，也从未去海外扩张征服，开疆拓土。相反，越是中国强盛的时候，就越是中外交流最频繁，中外关系最融洽的时候。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封建制度鼎盛的汉唐时期，即使在封建制度开始衰落的明清时期，中国也同样没有产生过要去侵略、统治别国的想法，依然对海外国家采取平等、友好、宽容的态度。这种和平主义思想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

在世界历史上，航海总是与探险、发现、征服、掠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15 世纪前期郑和的航海却既没有野蛮的征服和掠夺，也没有血腥的杀戮和摧毁。郑和率船队七次远航，历经 30 多个国家，从未占领任何国家一寸土地，从未建立任何一处殖民地，也从未掠夺他人的一分财富。他实行和平外交，尊重各地习俗，礼待各国统治者和人民，建立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他还努力促进文化交流，发展平等贸易，传播中外友谊。2005 年是郑和首航 600 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历史上这一伟大而和平的壮举。

一、明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

要谈郑和下西洋开展和平友好外交活动，就应该从明朝初期的对外政策谈起。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元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以其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为戒，确立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洪武二年（1369 年），也就是新王朝建立后的第二年，他便在所颁布的《皇明祖训》中明确告诫其子孙后代：“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①] 他在《祖训》中还将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西洋、渤泥等 15 国列为不征之国。这一对外基本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于保持明初中国与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 1402 年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明太祖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但与太祖不同的是，成祖不仅坐等各国前来称臣朝贡，而且还主动遣使前往远近诸国，实施“宣德化、柔远人”的外交政策。明成祖一即位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频频派出使臣访问周边国家。据史书记载，永乐元年至少有 10 批使臣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又有六批使臣被派往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 10 多个国家。这些使臣的主要任务是，前往告知新皇帝即位，将继续实行和平友好政策，同时颁发赏赐，以示怀柔，赏赐的规格也比明太祖时期高。

当然，明成祖派出的规模最大、行程最远、影响最广的外交使团，就是郑和及其船队了。郑和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七次远航，行程数十万里，时间长达29年，其中前六次都在永乐年间。从《明成祖实录》中可以看出，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人选，到船舶的制造、费用的支出等，无一不是在明成祖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郑和船队每次远航的时间、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也都是由明成祖亲自决定的。应该说，如果没有明成祖的决策和安排，郑和下西洋这样规模宏大的远航活动是绝不可能完成的。

那么，明成祖如此兴师动众、耗费巨资组织庞大的船队远航，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呢？对此，学者们见仁见智，进行过大量研究。

一个国家或政权的外交活动，总是为该国家或政权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明朝永乐时期的外交活动当然也不例外。了解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成祖朱棣并不是以正常方式继承皇位的，而是通过“靖难之役”成为皇帝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方面励精图治，发展生产，稳定民心，平息国内的不满；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让四方各国都前来称臣朝贡，以显示他是众望所归的“真命天子”而非篡位之帝。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经过长达4年的“靖难”内乱，以及明太祖后期实行的“海禁”，来华朝贡的海外番国日益减少。而在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中，“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国四夷之礼，自古皆然”，“帝王居中，抚驭万国”[②]。中国皇帝只有得到海外各国的承认，前来称臣纳贡，才算是“君临万邦，抚治四夷”，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尽管中外之间的这种“宗番”从属关系仅是名义上的，所谓的“四夷”基本上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共享天下太平”确实是明成祖的治国理想。

因此，诏谕海外诸番，恢复朝贡关系，以证明当今皇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就是明成祖派遣郑和率庞大船队远航西洋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也就是郑和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此外，据说郑和船队还负有一项秘而不宣的使命。明成祖的江山是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来的。建文帝下落不明，一直是成祖的一块心病。有传言说建文帝已逃到海外，因此派船队下西洋也可顺便沿途搜寻其踪迹。

为了通好异邦，招徕贡使，明成祖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派出有数百艘战船和数万名官兵的庞大舰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二是以“厚往薄来”的原则，通过赏赐和贸易的方式，让各国在经济上得到实惠。这种恩威并用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不久明王朝就打开了外交局面。尽管明成祖派郑和出使的根本目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但由于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方针，更重要的是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杰出才能的外交家，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是建立和加强了中国与沿途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友好关系。

作为中国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和自己所担负的外交重任非常清楚。他不辱使命，七下西洋，忠实和成功地执行了睦邻友好和平外交政策。他在海外以德服人，以诚相待，广交朋友，开创了中国“和平外交”之先河。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提高了明王朝在亚非各国的声望和地位，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许多国家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传播，加强了中外贸易的往来。郑和作为沟通中国与亚非国家友谊的使者，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郑和的和平友好外交活动

在从1405到1433年的29年时间里，郑和率大明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历大小三十余

国,涉沧溟十万余里"[③],为建立和促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郑和七下西洋的和平外交活动,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 遍访诸国,通告明朝的对外政策,巩固或建立友好关系,迎送各国来华使团

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数 10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宣诏敕封,颁发赏赐。敕封实际上就是中国皇帝对当地统治者的正式承认,这对于保持双方的和平友好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因而在明朝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到一地,郑和都以中国使者的身份上岸访问,向当地统治者宣读明朝皇帝的诏谕,颁赐册诰印绶,并代表明帝向他们赏赐丝绸、金银、瓷器等珍贵礼品[④]。这种开读封敕颁赏的意义,主要是从政治上强化中国与各国之间"宗番"从属关系,同时也向各国通报中国的情况和主张。这种宗番关系多为象征性的,在一般情况下,"宗主国"明朝政府并不干涉"番属国"的内政,也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番属国"。郑和在外交活动中遵循这一原则,尊重各国政治上的自主权。

郑和出使除了代表明朝政府敕封当地统治者,有时还敕封该国的镇国之山。敕封番属国镇国之山的做法是明朝永乐时期外交活动的一大创举。最初是满敕加国主动提出此要求,以表达臣服之意。明成祖十分高兴,不仅"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而且还"立碑其地",并亲自撰写碑文。此后明成祖还敕封了渤泥国、柯枝国的镇国之山,也都亲自撰写了碑文。而敕封和立碑的具体工作则都是由郑和率船出海时完成的。

在郑和的不懈努力下,明朝政府很快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这些国家纷纷派出使节前来中国,于是郑和船队又承担了接送海外使团的任务。郑和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臣携方物随船队来华朝贡,甚至有时外国国王也随船前来,当下一次郑和出海时又随船队返国。郑和第五、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就是护送前来朝贡的十余国使节安全回国,同时携带明帝的礼物赠送各国国王。

2. 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平息冲突,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局面

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各国间矛盾重重,互相攻伐,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中南半岛上的安南、占城、真腊等国家间经常发生战争;实力较强的爪哇、暹罗等国也不时对外扩张,欺压周边的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等弱国;苏禄、渤泥等岛国间也发生过冲突;有的国家甚至杀害中国使臣,拦截前往中国朝贡的使团。另外就是海盗猖獗,海上交通没有安全保障。这种情况,既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影响了中国与当地国家的交往,也直接影响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中国作为这一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大国,承担着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因此,调解纠纷,平息冲突,帮助各国解决彼此间的矛盾与争端,也是郑和船队的一项重要外交使命。

调解各国间的矛盾和冲突,郑和的主要做法就是进行和平的外交斡旋,对冲突各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利用大明王朝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少数一贯以强凌弱的国家,也采取一些必要的强制措施,以制止其侵略行为;而对凶残的海盗则坚决予以打击。郑和船队的这种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正义活动,相当于今天的"国际维和行动"。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有:郑和第一、第二次出使时恩威并施,迫使爪哇遣使谢罪,并改变了侵扰邻国、叛服无常的行为;第二、第七次下西洋时调解了满剌加与暹罗的纠纷,使两国长期和睦相处;第三次出使时先礼后兵,成

功解决了“欺寡凌弱、结怨邻境”的锡兰国王的问题。经郑和多次来往于各国之间的斡旋调解，东南亚和南洋地区基本实现了和平安宁、海路畅通的稳定局面。

3. 以实力为后盾，军事行动与外交行动相结合，促进和平稳定国际关系的建立

外交斗争也需要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与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因此他尽可能地用和平手段来处理各种问题和争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郑和船队也曾多次遇到重大的威胁和挑战：有海盗的袭击、有敌酋的暗算、有篡位者的起兵叛乱，还有国家间的以强凌弱等。郑和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被授予“钦差总兵太监”头衔。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虽然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手软，对顽敌进行了坚决的打击。正如郑和自己所说的那样：“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5] 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和平的外交行动，促进了明王朝与沿途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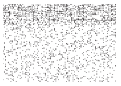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 29 年间，曾有三次较大的战斗：第一次是永乐三年（1405 年）首下西洋时剿灭盘踞在旧港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二是永乐七年（1409 年）三下西洋时制服阴谋劫掠明军的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 年）四下西洋时帮助苏门答腊平息内乱，俘获挑起叛乱的伪王苏干剌。在这三次军事行动中，郑和都是先礼后兵，以和平方式“遣人诏谕之”，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固不化，甚至阳奉阴违、试图偷袭的情况下，郑和才遵循自卫反击的原则，出兵予以打击。郑和舟师获胜后，并不派兵驻守和占领有关国家，仍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尽可能地使该国能够长治久安。在锡兰，采取的办法是另立贤者为国君，在苏门答腊，内乱平息后迅速恢复了秩序。即使用兵，郑和也不随意杀戮，所俘获的贼寇都解押回国，交由永乐帝处置[6]。结果是“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因此，可以说郑和船队既是一支威武之师，更是一支和平之师！

4. 厚往薄来，互通有无，发展海外贸易，促进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然而也带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这首先体现在朝贡贸易方面，各国遣使向中国进贡当地珍贵的土特产品，中国则赏赐给对方丝绸、瓷器、金银、工具等物品。明王朝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赏赐给外国的物品在价值上要远远高于外国朝贡的“方物”。尽管朝贡贸易并不是一种符合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更多的是体现宗藩关系的政治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到了中外之间物品交流、互通有无的作用。

郑和船队出海时，所携带的大量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以及茶叶干果、金银钱币等，除了一部分用作赏赐的礼品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作与海外进行贸易的商品。这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也是明朝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途径。船队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如香料、染料、胡椒、硫磺、象牙、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等。在郑和后几次下西洋时，这种公平自愿、等价交换的海外贸易的特点更加突出。这种贸易不仅满足了海外各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带回中国的“夷中百货”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不仅开展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文化。当时一些亚非国家的经济、社会水平比中国落后，因此对灿烂丰富的中国文化非常向往。因此，“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7]，也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之一。通过郑和的多次远航，中国的儒家思想、历法、医术、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技术、造船航海技术以及妈祖信仰等逐渐在亚非各地得到传播，同时也加深了



中国人民对海外的认识和了解,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三、郑和和平外交的深远影响

郑和从30多岁开始七下西洋,前后29年献身中国的航海和外交事业。他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1岁了,在回国途中病逝在印度古里,永远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航道上。郑和下西洋忠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在郑和经过的东南亚地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当地人民对郑和的热爱与崇敬,已成了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1. 万国来朝,盛况空前

郑和下西洋的成功使中国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影响达到了高峰,出现了"四夷归附,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

据《明实录》记载,在永乐时期,西洋共有30余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各国纷纷派遣使节前来朝贡。朝贡其实是一种外交礼节,外国使者带来本国的方物,然后带回中国皇帝的赏赐。双方互相赠送礼物,表示亲善友好和礼尚往来,并不是单纯的贸易关系。明成祖在位的22年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近到东南亚的占城(今越南)、暹罗(今泰国),远到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都有使者前来。永乐十四年(1416年)和十七年(1419年)甚至先后出现17国、19国一齐来朝的壮观场面,其中一次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以至当时形成了海外来使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充斥于廷"的景象。

一些国家的国王为了表达对明王朝的归服和忠诚,同时也想亲眼目睹天朝的强盛,亲自率领家眷和随臣到中国访问。永乐年间,先后曾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四国的七位国王率团前来。如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为感谢中国对他的支持,于1411年率王妃、王子以及540名随员的庞大使团随同郑和船队前来朝见明成祖。后继任的满剌加两代国王又分别在1419年、1424年和1433年三次携带家眷来华朝贡访问。由于旅途漫长,有三位来访的外国国王在途中病逝。如苏禄国东王返程时在德州病故,明成祖下令以王礼厚葬,并亲自为其写祭文,树碑墓。渤泥国王病逝后,也按其遗愿厚葬于南京。

来华的各国使团,无论人数多少,有无贡物,都能得到隆重的接待。他们能得到皇帝的接见和宴请,生活上安排得舒适周到,获得的赏赐也是相当丰厚的。明王朝这样做,一是表示对来使国家的尊重,二是展示自己雄厚的国力。郑和下西洋期间,永乐皇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首屈一指的。这种情形,正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一首宫廷乐舞《殿前欢》词中所唱的那样:"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廷,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卿,齐声歌太平。"[8]

这种"远人归慕,万国来朝"的局面,正是明王朝所追求的外交目标,它既有力地服务于内政的需要,又保证了一个睦邻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实现了"四海清宁,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

2. 永远的历史丰碑

由于历史原因,郑和航海留下的文献资料并不多,然而在沿途各国人民的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

丰碑。郑和船队在所访问过的国家留下了许多遗迹，包括郑和送给印尼亚齐王子的大青铜钟、船队登岸后在各地挖筑的“郑和井”、船队留下的大锚等，另外在各地还发现了许多明代的钱币、瓷器、金银、器物等物品，这些都是中外友好往来的证据。而在这些历史遗迹中，最有说服力的大概就是至今犹存的一些碑石了。

永乐五年（1407 年），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时来到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国（今印度的卡利卡特），看到这里山川秀美，民风淳朴，决定在这里建立碑庭，永志纪念。其碑文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⑨

永乐七年（1409 年）第二次下西洋时，船队访问了印度洋中的岛国锡兰山，在当地佛寺进行了布施，并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刻立了一块石碑。碑文为：“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清濂等昭告于佛世尊”，在佛祖保佑下，“人舟安得，来往无虞”，因此“谨以金银织锦、纻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⑩。500 余年后，该碑于 1911 年在斯里兰卡南部的高尔市内被发掘出土。这块被当地人称为“郑和碑”的石碑现保存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中。它不仅是中斯两国友好交往的珍贵文物，也是郑和登岸开展和平外交活动的见证。

郑和船队还在航线沿途留下了由明成祖御笔题写的《满剌加镇国之山碑》、《柯枝镇国之山碑》等。这些碑刻和郑和留在国内的长乐《天妃灵应碑》、太仓《通番事迹碑》、南京《静海寺碑》、泉州《行香碑》等碑石，完整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是记载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的历史丰碑。

由于郑和船队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深得沿途各地人民的敬仰和怀念。在郑和航行后的数百年里，南洋一带仍流传着许多有关郑和的故事和传说。在东南亚，有许多用马来文、印尼文、英文、荷兰文写下的有关郑和的史料。例如，在一部完成于 1615 年的《马来纪年》中，就记载了未见于中国文献的郑和护送明朝汉宝丽公主和亲马六甲王的历史故事。印尼学者林天佑所著的《三宝垄历史》中也谈到了郑和对爪哇三宝垄的访问，以及当地人民祭祀郑和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郑和被称为三宝太监，所以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菲律宾有三宝颜，印尼有三宝垅、三宝港等。这些地方的人们把郑和当作神明一样供在庙里崇拜、奉祀，常年香火不断。在一些民间传说中，郑和甚至成了超自然的神，不仅能呼风唤雨、造山造岛，而且还有镇妖避邪、治病救人等神力。印尼爪哇有一口“三宝井”，据说是当年郑和亲手开挖的，井水被人们视为“圣水”，可以治疗百病。“郑和崇拜”成了东南亚的一种特殊现象，无论是遵奉中国儒道传统的华人、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信仰佛教的泰国人，还是信仰基督教的印尼人、菲律宾人以及信仰其他宗教的土著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尊崇郑和这样一位真实的历史伟人⑪。

四、郑和与西欧航海家的比较

为了说明郑和航海的和平性质，我们不妨将郑和与稍晚的欧洲航海家们作一个比较。人们都知道，西班牙人哥伦布在王室的支持下，于 1492 年向西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比郑和晚了 87 年）；葡萄牙人达·伽马也是在该国王室的支持下，于 1497 年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到达印度（比

郑和晚92年);另一个葡萄牙人麦哲伦及其船队则于1520~1522年穿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完成了环球航行(比郑和晚116年)。他们的这些活动,被统称为"地理大发现",这几位欧洲人也被誉为"伟大的航海家"。然而,与郑和下西洋相比,欧洲人的远洋航海不仅在时间上晚了将近100年或者100多年,而且在船队规模、船只大小、航海技术、航行次数等方面也比郑和船队落后得多。然而,郑和与欧洲航海家们的最大区别在于,郑和船队所开展的是以德服人的和平外交,给当地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友谊、和平和幸福;而欧洲航海家们所到之处,从事的是开疆拓土、殖民掠夺,给当地人民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和痛苦。

从航海的目的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为了与亚非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而欧洲探险家却是想寻找通往神秘富饶的东方的新航路,征服领土,扩充版图,并掠夺黄金白银,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的航海协定中明确规定,如果哥伦布发现了新土地,就任命他为当地的副王和总督,其后代可以世袭爵位和权力,并可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哥伦布正是在这种财富和权力的刺激下"发现"美洲大陆的。如果中国当时有意要在海外开疆拓土,郑和船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完全有能力征服和占领大片土地,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如果中国有意搜求金银财宝,郑和的船队也可以巧取豪夺,满载而归。但郑和船队并没有这样做,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从航海的过程和结果来看,郑和作为中国的和平使者,所经之地,均以和平友好精神,敦睦邻邦,厚往薄来,以德服人。他尊重当地习俗,与当地统治者和人民以诚相待,通过交往传播文明,播撒友谊,赢得了沿途各国人民的欢迎和赞扬。郑和在七下西洋的29年中,通过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把中国先进的物质和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郑和统帅的舟师虽有27000余众,但既没有进行殖民征服,开疆拓土,也没有进行烧杀抢掳,掠夺财富。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航海家每到一处,便宣称对该地的占有,然后采取武力、欺诈等手段,进行强盗式的侵占和掠夺。哥伦布登上他"发现"的第一块陆地瓦特林岛后,立即召集船上的人员,举起王旗,宣布他已为西班牙国王和女王占领了这个岛屿。此后,西班牙人便源源不断地向他们的"新土地"派遣军队,任命总督,建立要塞,镇压反抗他们的印第安人。哥伦布本人便出任过海地的总督。同样,比郑和晚90多年的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古里)后,一登岸就"照例竖起一根标柱,作为葡萄牙王室已经领有这块土地的标志"[12],为了垄断新航路的贸易,葡萄牙人采取各种残忍无情的手段,恫吓往返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烧杀抢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达·伽马第二次前往印度时,截获了几艘从麦加返航的穆斯林船只,载有大约700人,他下令将船上的货物搬空后,竟放火连船带人一起烧了[13]。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为西班牙国王"发现"了菲律宾群岛后,他本人也拥有了几个岛屿。

欧洲航海家开通航路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残酷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亚、非、拉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为了攫取中、南美洲的黄金白银,西方征服者几乎将一些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斩尽杀绝。欧洲人还采取欺骗性的不等价交换,用不值钱的玻璃球、小镜子、别针、纽扣等东西,向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换取贵重的黄金、象牙和奴隶,以牟取暴利。自15世纪新航路开通后,西方殖民者还开始了罪恶的奴隶贸易。一支来复枪就能换到一个黑奴,一匹阿拉伯马能换25个奴隶。有人估计,在4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奴隶贩子从非洲运出了多达约1000万人的奴隶!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